

刚刚过去的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近代史研究在近代政治、思想文化、经济社会等领域发表了许许多多的论著，举办了各类大型学术研讨会，从新视野、新视角、新理论、新方法、新材料等层面进行了多方面的具体探究。特别是重点回顾了70年来的史学成绩、总结了好的经验做法，提出了新的发展方向。本文选取部分代表性文章，进行简要介绍。

2019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热点综述

■ 王富聪

全方位总结70年来中国史学研究成果

回顾了70年来中国史学研究的历程。陈锋的《与时代同行——中国经济史研究70年》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指导下以及在倡导科学研究的氛围下，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史研究取得引人瞩目的成就。罗敏的《民国史研究七十年——成就与新趋势》回顾了民国史从确立逐渐走向成熟，提出未来的民国史研究应当突破民族国家叙事的局限，将民国置于世界历史进程中加以考察，从全球史视角重新审视民国时期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独特历史道路。崔志海的《晚清政治史研究70年回眸与展望》提出晚清政治史在过去70年里一方面取得丰硕成果，但同时也有待提升史学研究理论与学术与政治、历史与现实的有机统一，进一步加强史料的挖掘、考辨和利用，正确看待和处理晚清政治史研究中的各种范式，在吸取既往成果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与清史和

中国近代史两个学科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独立的晚清政治史学科。王建刚的《中国近代史研究70年（1949—2019）》认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获益于社会的进步，获益于平等的学术对话，获益于社会的开放与对外学术交流的拓展。瞿林东的《探索史学历史 促进史学发展——新中国70年史学史研究的繁荣发展》认为，70年来，中国史学史研究不断探索发展、开拓进取，在研究者的认识、著作的类型、理论的发掘以及专业人才培养等诸多方面呈现日新月异的状态。戴逸的《新中国70年来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强调，唯物史观的指导是历史研究科学性的保障，可以帮助我们面对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时把握正确方向，看清历史的真面目，围绕人类发展的根本问题展开思考，避免“碎片化”的倾向。但马克思主义不是僵化的教条，创造性地而不是教条化地理解马

克思主义，才是正确道路。既要坚持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又不能故步自封，坚持开放的心态。马克垚的《70年砥砺前行中的中国世界史学科》提出，世界史学者应当从社会史学观察问题和思考问题的方法；既要百川汇海，也要在一定领域力求专精，深入钻研，从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史学科。

努力构建新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马敏的《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化史理论体系——新中国70年史学发展的一个侧面》认为，根据中国现代化的实践经验，在借鉴与反思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基础上，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史理论体系，是新中国史学发展的最新进展之一。高士华的《加强抗日战争研究的学术史梳理，抗日战争研究七十年来跌宕起伏、曲折前行，收获颇丰。如何继承优良传统，加快构建抗日战争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是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朱汉国的《70年来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的成就与新使命》指出，70年来近代史学科建设成就突出表现

在：近代史学科体系的建立与发展，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内容体系实现了向“通史”的转变，以及研究方法的不断探索和创新等。

新的研究视角蔚然成风，出现了“身体转向”“动物转向”“跨国转向与全球转向”。身体史研究得到高度重视，这方面的研究有唐棣宣、吴光会《身体史：改革开放史研究的新视角》等。人与动物关系史得到较大发展，沈宇斌的《全球史研究的动物转向》指出，当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书写全球动物通史和历史分期、探寻全球网络联系形成过程中动物的角色以及比较不同时空背景下人与动物关系的异同这三个议题。王立新的《民国史研究如何从全球史和跨国史方法中受益》提出历史研究的跨国转向与全球转向是当前国际史学界最强劲的学术潮流，引入该方法可以让研究者更加重视世界性潮流和国际环境变化对中国的历史影响，关注跨国思想、资本、商品、技术、制度的输入对中国的冲击以及考察民国历史上的跨国团体和跨国现象，丰富和深化对民国历史的阐释。

五四运动成为思想史研究热点

2019年是五四运动爆发一百周年，五四研究引发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围绕近代新思想、新观念和知识分子进行了深入探讨。

耿云志的《五四：现代中国的新起点》认为，五四运动是中国政治革命的新起点。杨念群的《五四前后“个人主义”兴衰史——兼论其与“社会主义”“团体主义”的关系》认为，“个人主义”是五四时期最重要的思潮之一，对于渴求个性解放和个人独立的五四青年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但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不久，对“个人主义”的正面阐释逐步退潮。翟骏《瓦路的小镇青年——钱穆与五四运动再探》认为，钱穆是在深入了解和积极参与了五四运动之后，疏离和反思了五四运

动。彭姗姗的《五四期间杜威与中国的一段“交互经验”》认为，关于杜威访华的既存研究大多在“影响—接受”的框架内展开，但这一思路忽略了杜威本人与五四时期的中国都是复杂多元的变量。杜威在华讲演，是哥伦比亚大学、各家邀请方、各级政府、媒体、听众及杜威的主观愿望和工作相互协调的结果，亦深受美国国内形势和世界局势影响。马建标的《五四时期恽代英国家观念的养成及其救国实践》认为在五四运动期间，恽代英的目标已经不再局限于“反日”，而是通过传播日本的侵华故事来弘扬爱国主义观念，启蒙大众。程美东的《新知群体与五四运动》认为五四就是新知群体对于国

家被列强蹂躏、社会被无能腐败的官僚阶层统治失望的悲愤意识的激情表达，标志着新式精英知识群体以整体的自觉来承担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重任。

在研究视角和方法上，通过词汇和概念研究不同时代观念的演变，体现了思想史研究路径和方法的新变化。王士皓的《近代以来“规律”的语义变迁——以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为重点的考察》认为，“规律”是现代汉语的常用词，但是其“客观性”“必然性”含义的最终确立却只有几十年时间。在古代汉语中，“规律”是指人为制定的“规章制度”。“晚清以降，随着科学观念的传入，“规律”一词才有了“客观性”“必然性”的转义，但这一义项并未得到普及。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规律”逐渐成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表示“客观性”“必然性”含

义的正式术语。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规律”不仅完成了自身的彻底转义，并在与其他相关词语的比较中取得优势地位，成为表述“客观性”“必然性”最常用的术语。黄兴涛、陈鹏的《民国时期“现代化”概念的流播、认知与运用》论述了“现代化”概念传入中国后，即被运用于追寻“国家现代化”的整体诉求中，体现出全方位变革的综合性认知趋向。李里峰的《“运动时代”的来临：“五四”与中国政治现代性的生成》认为，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代表和唤醒“群众”，以“主义”解释世界，以“运动”改造世界，逐渐成为各种新兴政治力量共享的行为模式。任吉东的《概念史视域下的近代城市苦力》通过对“苦力”进行考察，认为“苦力”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词汇，更是反衬时代、体映行业和折射底层群体的缩影。

新文化史研究百花齐放

2019年社会文化史和新文化史持续活跃，运用新文化史视角研究成为普遍现象。

阅读和接受史研究受到广泛关注。夏静的《在政党与国家之间——〈义勇军进行曲〉接受史》认为，《义勇军进行曲》抗战期间在国民政府的推动下，逐渐成为“最流行的抗战歌曲”。抗战结束后，随着国共两党合作走向对立，国民党从利用转为禁播，共产党则逐步重视。此曲的传唱和接受过程，呈现了歌曲和政治力量的复杂互动。金伯文的《论持久战在中共抗日根据地的阅读与接受》认为，在基层的社会教育与战士教育中，《论持久战》的核心观点则被“简化”，成为民族意识教育、政治常识与文化知

识学习的一部分。

关于历史记忆视角。《精神内涵再诠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五四记忆》认为，新中国成立后，五四运动随着时代变迁，成为具有丰富内涵的精神财富，其历史记忆绵延至今。五四精神作为当代中国重要的政治文化概念，被赋予诸多层面的精神内涵。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五四纪念持续宣扬革命精神。“文革”结束后，将“五四”传统定义为“科学与民主的精神”。新世纪以来，创新精神成为改革开放新时期五四精神的重要内容。当下，五四精神被进一步凝练和归纳为“爱国、进步、民主、科学”。

关于文化和社会形象研究。刘晓琴的

《晚清民初留学生社会形象及其演变》认为在清末民初社会形象演变过程中，留学生从社会边缘走到了舞台中心。刘丽丽、徐振岐的《20世纪30年代初国内外舆论界对马占山抗战的形象塑造及影响》认为，美国《纽约时报》、英国《泰晤士报》等外媒对马占山抗战的高频报道扩大了其国际影响，对促进各国政府对华政策的演变和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起到了一定作用。贾钦涵的《西方接吻文化在近代中国的受容与变迁》提出，接吻文化在近代中国的形塑与传播，集中体现了中国社会接受外来文化、变革两性关系、重塑道德标准的历史进程。针对接吻文化泛滥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人们从“礼仪”“卫生”“风化”等层面开展了持久的争论，政府管理者也以维持伦理道德为重，积极干预接吻文化的传播。

关于话语研究。黄兴涛的《强者的特权与弱者的话语》指出，作为一种概念工具的“治外法权”，在清末有效充当了效法西方和日本的改革舆论之话语组件，但五四运动及其后，成为帝国主义罪恶的象征符号和动员国人反帝的话语武器。涉及话语研究的此外还有《青年与时代：改革开放以来五四纪念话语的演变》等。

关于报刊史研究。在观念史、新文化史、社会史和思想史视野下的新闻报刊史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洪煜、符晓林的《权力文化视阈下的近代上海报界组织研究》认为，20世纪20年代以来，在近代上海新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下，政府权力逐渐渗透到报界组织中，报界组织的性质随之发生了相应变化，报界行业组织也从一民间行业组织逐渐成为受政府控制的准官方行业组织。

政治史研究求变求新

近年来，随着新的议题和资料的不拓展，政治史研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2019年，革命史研究日趋新潮，抗日战争史硕果累累。

革命史研究依旧保持较高的热度。在研究内容上，中共制度史研究取得较大进步，黄道炫的《如何落实——抗战时期中共的贯彻机制》提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能力和领导艺术日臻完善，贯彻机制的效能日益凸显。在革命理念和政治文化的范导下，会议、巡视、检查、突击、竞赛、群众路线、数字管理这些具体的落实机制交相影响，共同打造着一个效能优先、有令必行的

落实体系。关于推动革命史研究的视角和方法，一些学者进行了热烈的探讨，陈红民的《“新革命史”学术概念的省思：何为新，为何新，如何新？》和李金铮的《关于“新革命史”概念的再辨析——对〈“新革命史”学术概念的省思〉一文〉的回应》先后发表，引发了学者的广泛讨论。《中共党史研究》为此还开设了“新革命史”专栏进行讨论。从多个层面推动了对革命历史的研究和反思。

抗日战争史研究在研究内容上出现了一些新的议题。魏文亨探讨了抗战时期的直接税人员培训制度，毛光远的《抗战时期

国民政府军马补充机制及其困境》讨论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军马补充机制及其困境。朱琳的《铁血与合法：抗战时期漫画的空间出版》探究图像表达的民族化与阅读模式的公共化、政治化，如何促发了漫画阅读的普及与接受。黄伟的《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对沦陷区青年学生救助研究》发现，中共针对沦陷区青年学生的现实状况，不失时机地采取相应措施，救助并吸收青年学生加入到自己阵营，注意对青年学生开展各种救亡运动。

一些学者探讨了档案与历史研究的关系。张仲民的《阎锡山与洪宪帝制》通过揭示阎锡山支持袁世凯背后的内在逻辑，阎锡山与袁世凯的互相利用关系，以及当时的帝制文化构建情形及其实践效果。指出阎锡

山后来在个人回忆中利用其收藏的来往函电等档案资料，重构了他同袁世凯的关系，大大美化自我形象，以掩饰其昔日参与洪宪帝制的行为。提醒当今近代政治史研究过度依赖的所谓档案资料，内中实存在不少陷阱与局限。

关于晚清政治研究。翁有的《清末民初省与中央关系刍议》指出，结束割据和战乱状态，实现和平与统一之道，历史选择了中共的反帝反封建和实行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推翻军阀的革命道路。这就是清末民初省与中央关系演变的历史大势及其历史性的突破。刘晨的《太平天国乡官政治再研究——以乡官群体为中心》分析了1860年代太平天国231位乡官群体的乡官群体。



2019年12月27日，由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和科研局主办、当代中国出版社协办的《新中国70年》出版座谈会在北京召开。这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编写的《新中国70年》共40余万字，将新中国成立70年的历史放到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斗争史、中国共产党近百年奋斗史中来观察和书写，梳理新中国70年的光辉历程，唱响礼赞新中国、奋斗新时代的昂扬旋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和把握中弄清楚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为在新时代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新中国70年》全景呈现新中国70年伟大飞跃的光辉历程，根据70年历史

《新中国70年》出版座谈会在京召开

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分为探索篇（1949—1978）、改革篇（1978—2012）、强国篇（2012—2019）三个篇章展开论述，涵盖新中国70年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国防和军队、“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外交、党的建设等方面，对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事业都有简明扼要的阐述，全面反映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从开创历史新纪元到开启新时期、跨入新世纪，从站上新起点到进入新时代接续书写的历史华章。

《新中国70年》发挥历史作品“不忘前人、激励今人、启迪后人”的作用，对新中国70年间探索、开辟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的历程和经验进行系统总结，同时对探索中的成功与失误进行探讨，并对一些规律性认识做出理论概括。

《新中国70年》是国史学界多年来努力取得的重要研究成果。这部著作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新中国史的重要论述精神贯穿于全部内容中，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党史新中国史的最新认识。在内容起止时间上，是迄今为止涵盖时间最长的新中国史著作，完整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磅礴历程和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

跃。在叙述方式上，不仅主题鲜明、逻辑严谨，而且文风朴实，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与会专家认为，深入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习党史、新中国史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必须树立正确的政治方向、价值取向、学术导向，毫不动摇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待党和国家的历史，旗帜鲜明地运用唯物史观指导国史研究，引导学术界、思想界和全社会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确认识和高度认同。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

清醒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希望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深刻认识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认真学习党史、新中国史的通知》，强调“要把学习领悟党史、新中国史作为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的重要途径”。《新中国70年》对于进一步推动学好党史、新中国史，增强守初心、担使命的思想和行动自觉，具有重要意义。

（文光）

